

《古文孝经孔氏传》的回传

〔美〕何兰若(Laura E. Hess) 王振华译

18 世纪中叶，孔安国（活跃于 126~117）的《古文孝经孔氏传》的回传，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此前，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单向的。6 世纪梁末的大动乱中，《孔传》在中国第一次失传，几十年后它突然重现天日，使得隋代学者质疑该文本的可靠性。虽然《孔传》继续存在了几百年，在 10 世纪五代时期再次遗失。只有古文孝经的经文保留了下来。

自从 604 年圣德太子（573~621）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引用了《孝经》以后，该书在奈良时期之前已经传到了日本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了^①。大概不久之后《孔传》也传到日本，因为 701 年或 702 年《大宝律令》颁布后，官方要求研究《孝经孔传》和《孝经郑注》^②。唐玄宗的《御注孝经》传到日本后，在 860 年取代《孔传》和《郑注》，成为官方认可的《孝经》注疏，就像它早于 100 多年前在中国的地位一样。即使这种忠诚已然改变，日本学者仍然允许研究《孔传》，只要他们愿意这样做，哪怕唐玄宗的御注已用于官方场合，《孔传》在文人学士中仍一直影响广泛，并且持续到德川时代。

太宰春台（1670~1747）是获生徂徕（1666~1728）的得意门生，积极倡导古学（kogaku），他意识到《孔传》在中国已经失传，很可能德川幕府把山井昆仑（卒于 1728）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送回中国这一事实也激发了春台，1732 年他出版了《孔

传》并把它传回了中国，在清代学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③。18世纪中叶清代学人囿于怀疑该文本的可靠性，因为该书两度失传，只在失传大约800年后重现过一次，无疑，《孔传》在日本发现的结果必然是引发对其可靠性的繁复而热烈的讨论。

1776年，春台的《孔传》重印于鲍廷博主持刻印的《知不足斋丛书》第一集，也收入《四库全书》。《知不足斋丛书》版附有卢文弨、吴騫和郑辰的序以及鲍廷博自己的跋文。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孔传》再出现在清代学者中激起的喜悦，学者们认识到《孔传》这部失传典籍的价值。他们提出了文本上的证据证明日本版和《孔传》早期版本的引文一致，但他们仍对其绝对可靠性心存疑虑。

其它清代学者的反应则有欠宽容。在许多场合，甚至可称尖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承认《孔传》好像传到了日本，可以用早期文本的引文来校勘，但他们又判定该书从语言和风格上讲，都是一部日本人的伪作^④。

《孔传》重印于《知不足斋丛书》和《四库全书》，意味着许多学者可以一睹先前失传的典籍。不少清代学者，包括孙志祖（1737～1801）、张宗泰（1750～1832）、阮元（1764～1849）、周中孚（1768～1831）、瞿中溶（1769～1842）、丁晏（1794～1875）、郑珍（1806～1864）和李光廷（1812～1880）在内，提出了文本的真实性问题，他们的指责基本一致。尤其重要的是，丁晏、郑珍著文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这两位争论了《孔传》是否为伪作的问题。丁晏甚至指认王肃（195～256）就是伪作者^⑤。在有关《孔传》真伪问题的各种讨论中，丁晏的看法非同寻常。因为他未把伪作者归咎为日本人，而是中国人。既然大多数清代学者不熟悉日本的历史资料，他们没有意识到《孔传》文本在日本的流传有丰富的史料记载。虽然他们可以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也收入《四库全书》）中了解《孔传》传到日本，但民族主义思想和偏见妨碍他们大多数人承认春台编辑、出版并传回中国的文本，该

文本从隋代到五代时期保存在中国。

1778年，也就是鲍廷博重印春台版《孔传》的二年后，《知不足斋丛书》中重印的三个副本由清代商人带回日本。1778年，卢文弨、吴騫、郑辰作序，鲍廷博刻印的《知不足斋丛书》本《孔传》作为独立的一卷，和日本杰出学者、藏书家木村蒹葭堂（1736～1802）的序一起在日本出版。木村蒹葭堂在序中赞扬春台把《孔传》传回中国的功绩。第二年，在春台生前死后出版其多部著作的出版商嵩山房重印了春台编辑的《知不足斋》本《孔传》，同时还刊印了春台弟子大盐鼈渚（1717～1785）撰写的序言。

这两种著作的出版在德川学术界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先此，由于朱子学的广泛影响，《四书》牢固地占据学术的中心地位。在春台版《孔传》传回中国之前，即使《孝经》被用于学校教育，通常也不是采用唐玄宗的《御注》或《孔传》，而是朱熹（1130～1200）的《孝经刊误》——包括一章经和十四章注的一个基本定本，还有董鼎（元代）的《孝经大义》和吴澄（1249～1333）的《孝经定本》，后两者依循着朱熹的思路。

《孝经》的春台版有多种理由可以扭转这种潮流。不仅春台自己名声好，他的老师徂徕也家喻户晓，享有盛名。1728年徂徕去世后仍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春台的著作传到了中国，而且被收入两大丛书——《知不足斋丛书》和《四库丛书》。中国刻印的《孔传》春台版再传回日本，结果多次重印，影响遍及日本，不久成为江户时代最流行的《孝经》版本。

这引来日本学者撰著的为数可观的《孔传》研究论著，正反两方面的反应都有。这些反应折射出德川学术的氛围——包括汉学者（kangakusha）、国学者（kokugakusha）和那个时代的其它学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片山兼山（1730～1782）深受春台版《孔传》的鼓舞，著有《古文孝经标注》和《古文孝经参疏》，分别出版于1772年和1789年。片山兼山是所谓“折衷派”（setchūha）的学者，该学派反对门户之见，有意识地取众家之长。

《古文孝经标注》包括旁注、考证《孔传》引文的来源，解释某些含混的用语，标出异文。《孔传》在日本学界的反应和在中国的反应迥然不同。在中国正热烈讨论《孔传》的真伪，妨碍了对该文本价值的普遍承认，也造成了一种无人认真看待正在进行的、对该书深入研究的气候。

日本的情形在某些方面和中国相差无几。也有些学者撰文指责《孔传》。在《近闻偶笔》——吉田篁墩（1745～1798）身后的文集中，这位井上金峨（1732～1784）的弟子、所谓“折衷派”的成员，提出了春台版的许多问题，提醒学者在引用该书时要小心谨慎^⑥。1788年，藤田幽谷（1774～1826）——一位水户派学者（水户学派主要引征朱熹的观点）撰文讨论《孔传》中大量问题。依他看来，那些问题使《孔传》的真实性大为可疑^⑦。1811年，《孝经》学者片山兼山的儿子朝川善庵（1781～1849）——也是折衷派山本北山（1752～1812）的门生，无疑受其父的影响出版了《古文孝经私记》，书中论述了《古文孝经》和《孔传》的可靠性。虽然朝川善庵相信《古文孝经》是可信的，但他认为与之相伴的《孔传》是伪作，并提出了充分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论点。

日本人对《孔传》的反应，最令人感兴趣的一面是有许多学者借口批评春台版《孔传》，对春台进行人身攻击。诸葛琴台（卒于1810年）在论述春台版《孔传》的长文中，提出了丰富的证据表明《孔传》是六朝时的伪作^⑧。他也批评春台的研究粗疏失察，未能辨出《孔传》的真伪。杰出的国学者平田笃胤（1776～1843）在《气吹舍笔丛》中收录了论《孝经》和春台的《孔传》序言的条目^⑨。平田笃胤批评春台没有考证出《孝经》和《孔传》都系伪作。他也抱怨春台和他的汉学同道不加批评地吹捧谄媚所有来自中国的事物，结果轻视贬损自己的国家。从这些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春台在日本的声誉大大得益于向中国回输《孔传》，随后再传回日本，但当他成为没休止的批评目标时，这种声誉也蒙受了污损。

春台版《孔传》在日本出版 60 多年后，另一个《孔传》版本也在日本重印并传回中国。1798 年，林述斋（1768～1841）在《佚存丛书》的第一帙出版了另一版本的《孔传》。林是大盐鳌渚的弟子，而大盐本人也是春台的门生，为嵩山房重印的《知不足斋》版《孔传》写过序言。林述斋的《孔传》版本颇具价值，因为他复现了自 1279 年以来的日本写本。自他领导幕府的昌平坂所、热情倡导朱熹学说以来，他对《孔传》的关注，表明在 18 世纪末《孔传》文本得到广泛而普遍的认可。

我们知道，林述斋的《佚存丛书》在出版后不久即传到中国，因为阮元 1822 年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提到该丛书中的 10 种，虽然《孔传》未列其中^⑩。《佚存丛书》导致了《孔传》自日本的第二次回传。该丛书 1882 年在中国重印，但此时《孔传》的重视未受清代学者重视，这无疑因为清代学术界学术关注点的变幻无定。

春台版《孔传》传入中国导致一个重大事件——同样有争议的《孝经郑注》也传回中国。这部有时候归于郑玄（127～200）的著作，五代时期也在中国失传。但后来在宋代传回中国，以后又失传过一次^⑪。虽然《郑注》在日本保存并未完好无缺，但它以摘要形式保存在《群书治要》的第 9 卷。这部唐代编纂、在中国也失传了好几百年的书也保存在日本。在《群书治要》中，《孝经注》的作者也未标明。

《群书治要》在天明时代（1781～1789）由名古屋藩（han）重印，参与校勘工作的学者们认识到，《群经治要》中的《孝经注》事实上是《郑注》。虽然冈田新川（1737～1799）作为参与了《群经治要》校勘工作的学者，不是第一位出版《郑注》的人，但他在 1794 年出版了《郑注》，并像春台整理《孔传》一样，如愿传回中国，最终也收在《知不足斋丛书》中。

《郑注》的回归也轰动了清代学术界，一些学者为冈田新川版的可靠性辩护，其他人则指责它是日本人的伪作。和《孔传》相

似，1000 多年前，《郑注》的真伪问题在中国也受到质疑。对《群书治要》文本史的无知和民族主义的偏见也导致这些怀疑主义的观点，就像类似的想法影响了他们对《孔传》的态度一样。非常有趣的是，与春台版《孔传》明显不同，冈田新川的著作传到中国，收入《知不足斋丛书》，在德川学者中间并未能制造出轰动。主要因为冈田新川不像春台，既非引入争议的形象，也非徂徕门弟子。

《孝经》的《孔传》和《郑注》只是若干在中国失传的中国典籍中的两部，但保存于日本，在 18、19 世纪又自日本传回中国。其他著作包括《论语义疏》、《群书治要》以及《佚存丛书》中的种种，日本学者整理了这些著作，视自己为典籍的传承者和编辑者，对中国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深入研究这些典籍的回传，以及这种回传在两国学界的反响，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 18、19 世纪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就如同在中日文化影响流向发生变化的初期阶段，或在明治时代的扩展阶段，并且延续至今一样。

注：

①参见《日本书纪》、《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东京，吉川光文馆，1967 年）卷 1B，22. 142-143

②参见《令义解》（东京，吉川光文馆，1966 年）卷 22，3. 130

③关于春台著作的讨论，参见林秀一《太宰纯的孝经孔传校刊及其影响》，该文是林秀一《孝经》的第四附录（东京，明德出版社，1979）158-179 页。论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的定论是狩野直喜的《山井鼎和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见其《支那学文藪》（东京，好文堂，1927）128~209 页。

④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7：647-648。

⑤丁晏的《日本古文孝经孔传辨伪》见于他的《孝经征文》，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南京书院，1888）847：15A-19A。郑珍的《辨日本国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见其《巢经巢文集》1：3A-5A。

⑥见关仪一朗编《续儒林丛书》（东京，东洋图书刊行会，1930）第一卷，

1: 3-4。

⑦藤田的《读古文孝经孔氏传》，作于1788年，见于《孝经直解》1790年手写本卷首。藏于东京国会图书馆的档案。

⑧诸葛琴台关于孔传可靠性的观点见于他的《读太宰氏校定孔传孝经》（上、中、下），收入《真发山人集》，一部无日期手稿，藏于东京国会图书馆。

⑨见《孝经》条目和《古文孝经的序》，《平田笃胤全集》（东京，一致堂书店，1911）卷二，1: 23-26。

⑩见《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1: 1，1: 2，1: 12-13，2: 28，2: 34，3: 43-44，3: 51，4: 76-77，4: 76-77，4: 85。分别是《周易新讲义》、《泰轩易传》、《乐书要录》、《两京新记》、《臣轨》、《难经集注》、《五行大义》、《玉堂类稿》、《西垣类稿》、《文馆词林》条。

⑪关于《郑注》在日本的详细讨论，见林秀一《关于郑注在本国的刊行情况》，《汉文学讲座》卷四（东京，共立社，1933）。

本文原载 Sino-Japanese Studies (《中日研究》) 第6卷第1期

译者工作单位：商务印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